

召喚與凝聚—— 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

羅景文*

摘 要

不同於傳統士人，近代越南知識人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關心的不再是個人或是領導者在道德上的修為鍛鍊，而是從致良知、尊德性擴大到愛國與合群，從朝廷君王而轉向國家與民族。他試圖透過英雄系譜與國族神話的想像與建構，來召喚英雄與振興國魂。而他是如何尋找英雄，以建立國族的英雄系譜？這些來自四面八方，跨越不同時空的英雄，又是如何被他高度地混凝濃縮在愛國救國的論述框架之中，而成為國族敘述的主旋律？而他藉英雄建立的國族論述又有什麼特色，著重在那些層面？上述這些問題，是歷來研究者在探討潘佩珠之英雄觀較少處理的面向，因此，本文試圖先思考潘佩珠如何為越南民族運動，建構一套完整且可供運用國族英雄系譜。其次，進一步討論潘佩珠之國族論述的面貌與特色，即他如何透過英雄來鞏固國族、凝聚認同，寄寓整個國族的想像。

關鍵詞：潘佩珠、英雄系譜、國族想像、自我與他者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Interpolation and Solidarity: Phan Boi Chau's Construction of the Vietnamese "National Heroes" Genealogy and Expounding of Nationality

Luo Ching-We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in Vietnam, Phan Boi Chau (1867-1940) was no longer viewed as a independent leader of moral training, but he became the Vietnamese symbol of "Illuminated Consciousness." Through honor and virtue, patriotism, and unity, Phan turned his attention from maintaining a monarchy to establishing a nation. He made attempts to revive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heroes and develop national spirit by imagining and constructing genealogies of Vietnam national heroes and myth. Phan Boi Chau's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alogy of Vietnamese national heroes involves complex topics such as the self and the other, as well as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which all possess multi-faceted meanings and elucidation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how Phan Boi Chau constructs and emphasizes the genealogies of Vietnamese national heroes. It will then illustrate the key features of his expounding of Vietnamese Nationalism.

Keywords: Phan Boi Chau, genealogies of national heroes, imagination of nationhood, the self and the other

召喚與凝聚—— 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¹

羅景文

一、前言

1850 年以來，隨著法國殖民者的蠶食進逼，以及被殖民體制的逐步確立，激起越南士人極大的危機感，有的士人向順化朝廷上書建言，呼籲朝廷進行全面的更新改革；有的士紳則是組織武裝團體抵抗法國殖民者，形成所謂的「文紳」或是「勤王」運動，他們是越南抗法運動的第一世代。²他們雖然有著「忠君愛國」的訴求，但因其行動與理念的不足，使他們的抗法運動以失敗告終。³接踵而至的第二代愛國志士，在吸取借鑑各國新思潮和政治改革的基礎上，試圖克服前一世代的缺陷，例如在近代越南民族運動的代表人物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的身上⁴，

¹ 本文初稿曾以〈英雄與國族——越南儒學家潘佩珠的新關懷〉為題，發表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之「越南儒學傳統與創新」(Nho Giáo Việt Nam Truyền Thống và Đổi Mới)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9 月 5-6 日，越南順化），感謝諸位與會學者的指正與建議。修正之後復蒙《成大中文學報》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針對本文之題目與內容結構提出中肯剴切的建議，在此謹致謝忱。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² 日人白石昌也將越南抗法運動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世代是 19 世紀後半期，傳統知識人世代；第三世代是 20 世紀二〇年代之後，資產（小資產）與無產階級革命者世代。而潘佩珠及其同世代的知識人則屬於第二世代，具有新舊兩代的過渡色彩。詳見氏著：《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頁 6。

³ 陳鴻瑜認為文紳起義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學者們持著儒家思想，戰鬥力不足，活動範圍受到限制。學者們只獲得他們村莊的人的支持，而未能獲得其他村莊的支持。他們無法成為全國性的抗法領袖。其次，他們也受到其忠於家庭的傳統觀念的限制。法國威脅和恐嚇這些學者的父母，迫使他们投降。第三，學者的目標過於保守，只在於維護國王和官僚體系。法國保證給予人民文明生活，使得農民逐漸先去保護王室的熱心。」見氏著：《越南近現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 30。

⁴ 潘佩珠原名潘文珊，號巢南，又號是漢，為越南近代民族運動的重要領袖，也是重要的文史學家。

我們可以看到知識人⁵在肆應變局時所展現的新關懷，外有亡國滅種的危機，而內有衰弱的身體與國體，面對現實越南的急切困境與巨大匱缺，他所關注的問題不再圍繞著道德的修為與體制的維護，而是轉向國家和民族，擴大到愛國與合群。

但有什麼文化資本與思想資源，讓整個國家民族可以輕易地跨越目前滿溢而出的危機與挫折，維繫整個國族的情感與希望，在回味自身歷史的輝煌之餘，也能想像未來的榮光。於是乎，「英雄」在亡國滅種的集體焦慮之下，被請上時代的祭台，以其英靈成為拯救國魂的妙藥仙丹。⁶英雄興／新國，不僅能治療國家前途的昏暗沈鬱，更是「駕軼列強、雄冠五洲」⁷的興奮劑，投射既「新」且「興」的國族想像。由此可見，召喚英雄、想像國族，已是潘佩珠於世變之際展開現實關懷的重要主軸。

1867 年出生於義安省南壇縣，自幼跟隨其父（潘文譜，1830-1900）接受儒學教育。1885 年他決心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殖民，曾與六十多名同學共同組成「試生軍」抗法。1900 年潘佩珠中鄉試解元，然其父亦於同年逝世，此時的潘佩珠既有社會聲望，也放下了奉養父親的重責大任，因此他選擇一條與傳統士人不同的道路，開始聯繫全國各地愛國者，進行抗法運動，並於 1904 年 4 月成立「維新會」(Duy Tân Hội)。1905 年東渡日本，先後結識梁啟超(1873-1929)、孫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以及雲南廣西在日留學生，同時也與日本維新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犬養毅(1855-1932)等人有所聯繫，試圖爭取各種援助。之後，他多次來往於中、日、越三國，暗中進行革命活動，並號召越南青年學生赴日本留學，史稱「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因為他和其他志士的努力，至 1907 年已有二百位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學，但在 1909 年 2 月，潘氏與畿外侯彊抵(Cường Để, 1882-1951)因反法運動而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後來，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1912 年 2 月於廣州成立「越南光復會」(Việt Nam Quang Phục Hội)，並擔任總理。1913 年在廣州被捕入獄，至 1917 年獲釋。潘佩珠此後多以杭州為據點，推動越南的抗法革命運動。1924 年潘氏於廣州解散光復會，成立「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1925 年 7 月 1 日，為法國特務挾持於上海車站北站，解送回越後，被軟禁於順化御津，至 1940 年去世。相關生平詳見其自傳《潘佩珠年表》，越南河內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稿本，編號 Vhc.2138，此稿本未標明頁碼。

⁵ 「知識人」原為日文語境中對譯「intellectual」之譯詞，在中文語境中則多以「知識分子」表示。而余英時先生自 2002 年之後，主要以「知識人」代替「知識分子」，希望能由「分子」恢復為「人」的尊嚴，詳見余英時：〈士的傳統及其斷裂〉，收入氏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215-216。

⁶ 近代國族主義者在建構自身國族歷史時，最常運用援引的符號資源，便是本身民族的優良傳統，以及代表光榮歷史的民族英雄。而中國晚清也經歷了一場由知識份子所形構的英雄論述與國族想像，詳見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33（2000.6），頁 77-158。

⁷ [越]潘佩珠：《新越南》(Tân Việt Nam)，收入[越]章收(Chương Thu)編：《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第 2 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頁 436。

召喚英雄以振興國魂、凝聚認同，既是潘佩珠處於越南亡國之際的關懷主軸，也是研究者關注潘佩珠抗法民族運動的焦點之一。在 1967 和 1968 兩年，便有阮廷註⁸、阮董之⁹、章收¹⁰三人相繼發表論文探討潘佩珠英雄觀（主義）所指涉的對象或是身份。阮廷註認為潘佩珠所謂的「英雄」多為傳統封建階級的英雄。阮董之則認為潘佩珠的英雄觀具有新舊時期的過渡性質，既有封建階級的影響，也受到資產階級和農民愛國英雄主義影響，到最後甚至帶有无產階級英雄主義的成分。而潘佩珠心念所繫的英雄，隨著革命活動和情勢的發展，也從期待士人到以工、農為主的群眾階層。章收認為潘佩珠開創了新的英雄型態，雖然其筆下的英雄仍帶有強調非凡、個人、忠君的傳統性質，卻也開始注重平凡、無名、群眾、集體等新時代英雄的特性，而潘佩珠也認識到英雄人物的典範作用，他筆下的英雄擁有強大意志與熱情，雖知勇雙全，但非天生超人，而是透過不斷考驗鍛鍊而來。

這三位越南學者都承認潘佩珠的英雄論述對於鼓舞民族意識、促進民族團結、激發愛國熱情有很大的作用。但這三篇文章更著重於英雄的身份與屬性。這種密切的關注其實透露出學術研究與政治語境之間交錯糾葛的複雜關係。越南才於 1954 年走過脫離法國殖民的烽火，卻又掉入了與美國所扶植的南越政權相互對峙的泥淖中，並爆發所謂的「越戰」（1959-1975）。從「抗法」到「抗美」，潘佩珠的愛國熱情及民族團結主義，及其文學用以抵抗敵國、解放民族的大纛被高高舉起。但如何讓他的思想與行動能為當局服務，更具有論述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那就不得不處理他與馬列社會主義，以及無產工農階級的關係，並盡可能地牽合兩者的關係。¹¹因

⁸ [越]阮廷註 (Nguyễn Đình Chú):〈研究潘佩珠的英雄觀〉(“Tìm Hiểu Quan Điểm Anh Hù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文學雜誌》(Tạp Chí Văn Học) 12 (1967), 頁 1-14。

⁹ [越]阮董之 (Nguyễn Đồng Chi):〈潘佩珠英雄觀再探〉(“Bàn Thêm về Quan Niệm Chủ Nghĩa Anh Hù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歷史研究》(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111 (1968.6), 頁 15-23。

¹⁰ 章收:〈潘佩珠意識中的英雄人物〉(“Nhân Vật Anh Hùng theo Ý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原發表於河內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研究所主辦:「英雄主義學術研討會」,1968 年。後收入氏著:《潘佩珠研究》(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4),頁 555-583。

¹¹ 這種現象甚至讓同一個研究者對潘佩珠有著「曖昧的評價」。白石昌也發現越南著名史學家陳輝燎 (Trần Huy Liệu, 1901-1969) 在抗法戰爭結束後,批評潘佩珠的「同心說」,是以「封建階級」、「士夫」為中心。但到了抗美越戰時,卻又高度評價其「同心說」帶有「全民性格」。其前後評價的差異,正突顯了歷史論述與政局之間錯綜曲折的關係。相關討論,詳見氏著:《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

此，他筆下的英雄到底是不是工農英雄、群眾英雄，便是諸位學者討論的關鍵問題。

在上述三位越南學者之後，白石昌也亦加入討論潘佩珠的英雄觀。他認為越南學界多以第三世代的革命運動，即工農同盟無產階級階段作為參照的標準，來批判潘佩珠「精英主義」的革命路線，這是有失公允的。但若還原到上述筆者所討論到的時空背景與政治語境，我們其實不難理解這樣的狀況。而他試圖從潘佩珠之主張與立場的「內在理解」，來探討其「精英主義」所指陳的對象與性質。他認為潘佩珠的「精英主義」所指稱的對象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文紳士人，在潘佩珠的論述裡，常以「英雄」期許革命知識分子，「英雄」與「士」幾乎可說是同義詞，英雄是「士」階層裡的傑出人物，也是群眾的指導者。¹²

透過上述的研究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研究者對於潘佩珠的英雄觀——主要是對其英雄之身份與屬性的關注，比他如何透過特定歷史書寫框架，來建立國族英雄系譜，進而使讀者／接受者／被啟蒙者產生國族認同與想像來得更有趣。但實際上，潘佩珠是如何尋找英雄，以建立國族的英雄系譜？這些來自四面八方，跨越不同時空的英雄，又是如何被他高度地凝聚濃縮在愛國救國的論述框架之中，而成為國族敘述的主旋律？而他藉英雄建立的國族論述又有什麼特色，著重在那些層面？上述這些問題，是歷來研究者在探討潘佩珠之英雄觀較少處理的面向，因此，本文試圖先思考潘佩珠如何為越南民族運動，建構一套完整且可供運用國族英雄系譜。其次，進一步討論潘佩珠之國族論述的面貌與特色，即他如何透過英雄來鞏固國族、凝聚認同，寄寓整個國族的想像。

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第六章第三節「エリート主義——『英雄』と革命的知識人」，頁 210-211。

¹² 詳見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頁 194-215。

二、排外的英雄：抵禦外族的英雄系譜

潘佩珠曾在列舉「吾儕所受之痛史，與疆權者慘無人道之惡史」¹³的《天乎帝乎》中，提到法國殖民者的殖民教育狀況與政策，他說：

彼其教科書也，教授學科也，教員資格也，學生課程也，無非製造奴隸，陶鑄牛馬之材料耳。教科書之內容，但有歌頌法人之功德，炫耀法人之軍威，此外竟無一良好之文字。至於越南先人之如何建國，越南仁人義士之如何建國，皆禁而不得講。六歲兒童一入學校，一讀教科書，早已忘其為越南人矣。¹⁴

潘佩珠深刻地了解到教科書是型塑國家認同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重要工具，教科書的背後往往寓含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殖民者藉由意識型態的操弄，以便同化／馴化出一批忠於殖民者之價值觀的人群。他在此指出法國殖民教育的目的，一是培養出可供殖民者支配，既可靠又心存感激的本地人，一是切斷越南人與本身過去的聯繫，而代之以法國人之價值觀與思維。「去越南化」與「法國化」之兩手策略的運用，讓被殖民者忘記自身的過去，而歸順於殖民者所規定的現在和未來。¹⁵失去對越南過去歷史的認識與了解，就潘佩珠來說，這不只是「忘史」，甚至是「亡史」。連越南人都不承認或是已經忘記自己是越南人了，那就無異是宣告越南「國亡」和越南人「種滅」。

¹³ 潘佩珠：《天乎帝乎》，《潘佩珠全集》第5冊，頁584。可與之對照的是，在 Kelly Gail P. 對於法殖民者所設立之法越學校的研究裡，提到法殖民所提供的歷史教育是強調中國對於越南的支配，以及法國的偉大繁榮，以及對於歐洲和世界的貢獻。詳見 Kelly Gail P., "Franco-Vietnamese Schools, 1918 to 1938," (《法國－越南學校 1918-1938》) Ph.D. diss., Wisconsin University, 1975, pp.177-181. 陳立則扼要地指出：「通過法越教育輸入的是經過殖民者特殊處理後的『法國文化』。這種文化的主要內容只是對法國大國與善國形象的無限吹噓和對法國殖民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自我論證，屬於一種虛幻的文化移植，令越南學生感到迷失；而凡涉及越南民族歷史之傳統與文化的內容，也因為通過法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闡釋而變味，難為越南學生所理解和繼承。」見氏著：《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頁75。

¹⁴ 潘佩珠：《天乎帝乎》，《潘佩珠全集》第5冊，頁595。

¹⁵ 關於法國對印度支那殖民教育之目的，後來的研究者也提出與潘佩珠類似的觀察，詳見〔美〕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1999），頁133-134。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43-45。

既然「亡史」幾乎等於「亡國」、「滅種」，換句話說，形構自身歷史與國家存亡、民族延續有極密切的關係，那就必須在殖民教育之外，努力建構本族的歷史意識，並不斷與殖民者抗衡競逐，以維繫越南歷史之傳衍於不墜。而這其中的關鍵便在於「越南先人之如何建國，越南仁人義士之如何建國」。潘佩珠所謂先人與仁人義士的建國史，其實也就是國族英雄的建國史。潘佩珠雖然沒有接著多作解釋，卻在他處進一步申論：

今日世界懸性命於英雄之腦筋。世界一日無英雄，則世界不能以一日存活。無華盛頓則美利堅死，無波瑪等三傑則意大利死。無西鄉、木戶諸賢則日本死。英雄者卵育世界之布帛菽粟也。¹⁶

潘佩珠在此刻意拔高英雄的作用與重要性，英雄幾乎是世界存活運行的動力。在他的論述裡，這種看似放諸四海皆準的律則，其實是建立在他對近代國家與時代局勢的觀察與理解之上的。他認為近代民族國家之所以得以建國獨立，或是完成政局與體制的轉型，背後都有一偉大人物在推動著，到最後這些英雄不僅完成現世的功業，也成為寄寓國族想像與凝聚民族自信的載體。有了英雄這樣的憑依，國族也就不會因「亡史」，而淪落到「亡國滅種」那種全面崩潰的境界。

順著這樣的思維，潘佩珠進一步思考越南的英雄何在，如何尋找越南的國族英雄等問題。因此，他接著說：

吾愛吾國，吾不得不夢寐輾轉於吾國之英雄。十餘年間東西南北，奔走呼號而無聞也。嗚呼！何活英雄之寥寥也，則請起死英雄於地下，而香火尸祝之，亦吾愛吾國之一點兒也，作〈壯士高勝傳〉。¹⁷

既然明白英雄是國族的靈魂，國族賴此維繫認同、增進自信，那麼尋找國族的英雄自是在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集體焦慮下的當務之急，而這也是潘佩珠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匯流的展現。潘佩珠欲求活英雄不得¹⁸，轉而召請死英雄於地下，以建

¹⁶ 潘佩珠：《崇拜佳人·壯士高勝傳序》，《潘佩珠全集》第2冊，頁457。

¹⁷ 潘佩珠：《崇拜佳人·壯士高勝傳序》，《潘佩珠全集》第2冊，頁457。

¹⁸ 除了潘佩珠自己所提到不容易找到當世英雄的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他秉持「蓋棺論定」的原則，如他在自傳《潘佩珠年表》裡提到：「《越南義烈史》純為紀念諸先我殉國之同胞，凡所耳聞目見之

構屬於越南國族自己的英雄系譜，打造自身的國族特色。

潘佩珠在《越南國史考》(1909)描述越人始祖雄王(Hùng Vương)建國到完全成為法國殖民地(1884)之間數千年的歷史軌跡。潘佩珠在這本書裡召請的英雄，有來自上古時代的「建國之鼻祖」雄王，也有越南「排外強立」之英雄，其中包含了帶領越南脫離北屬中國而獨立建國的君王(被視為中興之祖)，以及其他雖未能帶領越南獨立，卻曾抵抗中國入侵的歷史人物，而無論成功與否都被列入國族英雄系譜之中。¹⁹潘佩珠雖然透過鋪排一系列「排外」英雄的事蹟，以呼喚種性、激發熱情，但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英雄早已是顯赫有名、為越南人所知的歷史人物，而且所謂的排外其實是抗「中(國)」英雄，英雄系譜的建構則止於抵抗明軍，建立後黎朝的黎利。這些英雄可以算是國族英雄裡的「老靈魂」、「熟面孔」，曾是民族的榮耀與輝煌，但隨著時代的遞嬗與視角的轉換，此時的國族也需要新一代的英雄。在尋找、建構新一代英雄系譜的過程中，潘佩珠曾有以下的感慨和焦慮：

壯矣哉！率烏合寡弱之徒以與強敵大國抗，彼目中已不問成敗為何物。義氣所觸，雄心所激，學青天而直上；雷電縱橫，挾滄海以俱奔，江河辟易。何等魄力，不誠可敬可畏耶。故曰生為我國人，死為我國鬼。有能與外國人為難者，如近年來北圻之莫廷福，富安之武著，河靜之陳賢，廣平之段志遵……一事無成，僅同鬼戲，然取其排外之心則皆英雄也。至於毒殺仇人之習兵，則尤可歌可誦，可馨香尸祝者，恨未得姓名事狀一編為英雄譜也。²⁰

事實，及所得於同志追述者，錄入是編。其尚未蓋棺之人，俱不登載，蓋有待也。」在這個變動激烈的時代，個人的政治與國家的立場可能隨時改易，能否前後一致，必須等到蓋棺之時才能徹底的檢驗，故潘氏所尋找的英雄自然不太容易是「活英雄」，更何況活英雄仍有待於「死英雄」的啟發導引。

¹⁹ 在《越南國史考》中潘佩珠提到的英雄有「中興祖」吳權(Ngô Quyền, 939-944)和「我國第一英雄之再中興祖」黎利(Lê Lợi, 1385-1433)，以及「排外而成功之英雄」，如陳興道(?-1300)、李常傑(Lý Thường Kiệt, 1018-1110)、楊廷藝(Dương Đình Nghệ, ?-937)，和「排外而失敗之英雄」，如徵女王(Hai Bà Trưng, ?-43)與黑梅帝(Mai Thúc Loan, ?-722)、李賁(Lý Bí, 503-548)、鄧悉(Đặng Tắt, ?-1409)與阮景真(Nguyễn Cảnh Chân, 1355-1409)、趙嫗(Triệu Âu, 225-248)與馮興(Phùng Hưng, ?-791)等人。詳見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423-430、476-488。

²⁰ 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488。

潘佩珠強調抵抗三國孫吳的趙姬與起義反唐的馮興不問成敗與否，毅然決然帶領民眾抵抗強敵大國（中國），無論生人死鬼都要為越南的獨立而奮鬥。揆諸今日，現在的越南同樣也得排拒強敵大國（法國）的侵略，也需要新的當代英雄，鼓舞士氣，因此他說只要有排外之心就是英雄。但令人焦慮的是，雖有新一代英雄，然其事蹟晦暗不明，也就未能建立民族獨立運動的新英雄系譜。新的「英雄譜」未立，「排外」的國族歷史便面臨斷絕的危機，歷史的連續性與整體感不再，國族也將難以為繼。

因此，潘佩珠自覺地走上尋找英雄的道路，他將目光移到地方與民間，以及自身所投入的越南民族運動，努力發掘能繼承國族精神的新英雄，以建構接續排外歷史的新英雄系譜。潘佩珠曾在漢文歷史小說《重光心史》²¹裡，提到他是如何從民間傳說和地方傳統得到召喚英雄的新資源：

今人經適姑渡，灑淚先朝，繫無窮之哀感焉。此中原故有舊史在，讀者能推而知之，無容饒舌。獨惜今我國史於重光帝事，所載甚略。當時同義諸人，僅阮景真即翁真、阮熾即翁熾、鄭悉、鄭容二父子，其他皆湮沒無聞。噫！何故也？蓋我國當時寧平以南，識漢字者絕少。稗官野史，皆以土字載之。其後漢文傳播，朝廷科舉，趨重於漢文，我人國遂弁髦土字而不錄。土字失

²¹ 潘佩珠自云《重光心史》是他被囚於獄中所作（1913-1917）的一部漢文歷史小說，根據章收教授的看法約完成於 1917-1918 年之間，後發表於《兵事雜誌》，在越南有抄本三種，均名為《後陳逸史》。章收與陳慶浩兩位教授均認為「重光心史」一名較「後陳逸史」來得適合，因為這是潘佩珠在其自傳裡所提到的名稱，在小說裡也多次使用「重光」這個名稱，突顯了重光帝陳季擴，以及圍繞在他身邊之一群義士的行動，體現作者寫作之深意。相關討論詳見章收：〈關於《重光心史》（或是《後陳逸史》）〉（“Về Tác Phẩm Trung Quang Tâm Sử (Hay là Hậu Trần Dật Sử)”），《潘佩珠研究》，頁 272-275。陳慶浩：〈《重光心史》提要〉，潘佩珠著，陳慶浩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重光心史》，收入陳慶浩、孫遜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78。發表於《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與越南抄本《後陳逸史》之差異，誠如陳慶浩先生所言「故事相同，而文字則大同小異」，但兩者相較，仍有一些顯著的不同。《後陳逸史》是作者借明朝張輔率兵攻佔安南，而陳季擴與阮熾、阮堅等士組織義軍抵抗明軍的故事來鼓舞人民抗法，因此小說中多有貶抑中國之語，如稱明軍為「吳賊」或「吳戎」，文中人名和地名也照實描述。但為了顧及發表場域（中國）與讀者，發表在《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已經大幅刪去對明朝的貶抑之詞，模糊了（不指明）對黎阮兩朝的描述，人名與地方也多作修改，如「順化」便換以「歸順」、「南平」、「韶城」與「京城」等名稱。總而言之，《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較越南抄本《後陳逸史》有「去越南化」的傾向，也削弱了原本國族論述的力道，因此筆者在底本的選擇上以越南抄本《後陳逸史》為主，原文可參見潘佩珠著，姚麗、嚴明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後陳逸史》。

傳，人湮事晦，吾國人愛國愛群之思想，日漸薄弱，淪胥至亡。由今回思，餘慟欲絕。予於二十年前，好與葵、襄土人結納，彼人不識漢文，但解土字。故氓遺老，樂向予談數百年前事，蓋從土字野史傳來者，予今述之，以告我國民。²²

《重心光史》講述的是越南陳季擴（Trần Quý Khoáng，?-1414）義集豪傑，共同反明復國，卻終至失敗的故事。適姑（今南定省豐盈縣）為陳季擴大敗明朝沐晟（?-1439）和呂毅（?-1408）之地，是越南抗擊強敵大國（中國）的光榮戰役。而當人們再回舊地時，發現景物依舊，但光榮的傳統已遠，不免觸景傷情。相對於可藉由史籍重新回顧／回味這段歷史的榮光，人們對於重光帝陳季擴所知甚少，至於同義諸人的事蹟更是湮沒無聞。潘佩珠認為是科舉漢文導致這段歷史失落無聲，更深層的意涵是指在科舉漢文的牢籠之下，世人熱衷於追求另一種文明，而捨棄了自身的文化與傳統，再加上失敗者在成王敗寇的書寫裡，往往是被忽視或是消音抹除的，因此這段歷史也就更難以保存了。

幸運的是，這段歷史還強韌地保留在當地的遺老身上，沒想到國族精神的復返竟來自「土字野史」，土字也就是民族語言，野史算是另一種民間文學。語言、民間文學與國族精神，在此透過耆老的講述而綰結為一，這不禁讓人聯想到 19 世紀以來，近代民族國家知識分子在民族意識的驅動之下，紛紛從民間文化與文學中尋找自身傳統，以重建文化和凝聚認同的過程。²³潘佩珠並未明說他投入民間文學運動的程度有多深，但很明顯地，他在民間文化／文學裡找到反抗排外的國族精神，並進一步將之挪用改造，「非有億千萬無名之英雄，以相與挽於前、推於後、提乎左、挈乎右，則此一鼎鼎有名之大英雄亦於何以表現？」²⁴這句話的現代意義是沒有多數無名英雄的投入，獨立革命不易成功。潘佩珠不僅召喚古往英雄，也鼓舞國民成為未來英雄，一同投入爭取民族獨立的行列之中。

潘佩珠提出了「有排外之心皆為英雄」與「無名英雄」的新觀點，英雄不必為

²² 潘佩珠著，姚麗、嚴明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後陳逸史》，頁 446。

²³ 詳見胡萬川：〈民族、語言、傳統與民間文學運動——從近代的歐洲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里仁書局，2010），頁 1-34。

²⁴ 潘佩珠著，姚麗、嚴明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後陳逸史》，頁 446。

顯赫有名或建立絕大功業者。接下來，潘佩珠努力將英雄系譜的歷史軸線延續至民間與當代，讓召喚英雄系譜、建立國族敘事的工程能得以完整，呼喚當代英雄，能與當代的國族取得更緊密的聯繫。而為了革命運動的需要與推展，潘佩珠不僅結交「葵襄土人」，更與各地綠林豪俠和勤王餘黨有密切的聯繫²⁵，在與他們互動的過程中，逐漸了解各地反法義士的活動情形。除了實際參與之外，也可能像《重光心史》那樣，透過這些義士豪傑講述週遭他人或自身的生命經歷，而得到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法故事。透過這些途徑，潘佩珠得以建構越南第一代抗法民族運動的英雄譜，他在《越南亡國史》（1905）裡除了分析越南亡國的原因，以及法國對被殖民者的壓迫之外，也記錄了越南民族運動第一世代，如何應勤王詔而血戰抗法的斑斑史跡。²⁶《崇拜佳人》一書更直接點明是為這些「無名英雄」立譜，《潘佩珠年表》便云：「念最近無名之英雄，有最當紀念而為予所知者也，凡數人，其一曰高勝，其一曰隊合，其一曰管寶，短刀壓陣，殺賊將名沒片（扇），以報高公勝之仇。予摭拾各事之始末，略分為傳，顏曰《崇拜佳人》。」

世易時移，越南抗法民族運動的重心已交棒給第二世代，不同於前一個世代傳統的政治理念與行動方式，這個世代對於如何進行越南革命運動的理念出現了分歧，其中以潘佩珠與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 1872-1926）兩人為主，彼此的政治

²⁵ 潘佩珠曾在自傳裡將其生平分為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便是：「為予壯年在未出洋以前，所潛養密謀、陰結豪傑種種行動。」在這個階段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囊中所餘者，則盡移為結客之需，凡綠林亡命及勤王餘黨，皆樂與予為秘密交」、「潘公（按：潘廷逢，Phan Đình Phùng, 1847-1896）餘黨諸頭目，予皆陰納之」、「（予）設帳徒在家，表面則授徒評文。贊同副吳以至白齒舊徒如檢共、黑龍，密友如徒奇輩，皆往來雜沓於予家。有間則往清義靜諸（按：指清化、義安、河靜三省）邊地，結納綠林之豪，琴、毛諸頭目，皆通款訂盟焉。」（《潘佩珠年表》）而上文所提到的「襄葵土人」即位於越南義安省西部邊境。

²⁶ 詳見潘佩珠著：《越南亡國史·國亡時志士小傳》，收入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全集·專集》之19（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5-10。章收教授所編輯的《潘佩珠全集》亦收錄《越南亡國史》漢文原文，然《全集》內所附漢文原文文字與句讀常有訛誤，故以《飲冰室全集》本為主。《越南亡國史》究竟為誰所著，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目前學界大多承認此書由潘佩珠完成正文，梁啟超撰寫介紹性資料。關於《越南亡國史》的著作權問題、傳播狀況，以及此書對於近代東亞反殖民運動的回饋與影響，詳見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學刊》1（2010.10），頁133-136，此不贅述。

主張與行動步驟有極大的不同。有別於潘佩珠的革命暴動、排法復越的想法，潘周楨提出了「倚法排君」的想法。希望透過體制內的改革，推翻越南的專制統治。潘佩珠在其自傳提到兩人觀點的不同，他說：

自是一連十餘日，公（按：指潘周楨）與予反覆議論，意見極相左。公則欲翻倒君主，以為扶植民權之基礎；予則先摧法賊，俟我國獨立之後，乃能言及其他。予所謀利用君主之意，公極反對；而公所謀尊民排君之意，予亦極不贊成。蓋公固與予同一目的，而手段不同。公則由倚法排君入手，予則由排法復越入手，此其所異也。²⁷（《潘佩珠年表》）

這場延續十幾天，卻沒有什麼交集的辯論，最後似乎並未影響到兩人的交情，「公政見反予，而意氣則極授予」。但分歧的主張卻對實際的民族運動帶來不少困擾：

先是予與小羅（按：阮誠，Nguyễn Thành，1863-1911）擁圻外侯（按：彊抵，Cường Đê，1882-1951），本欲利用君主以迎合一般人心，其真目的在驅逐法政府耳。因此名義，所以予出洋後，附和頗多。自西湖公由日本歸來，大唱尊民排君之說，專攻擊君主，而置法政府不問，創為倚法求進步之政策。一時輿論忽然紛紜，幾起黨爭之禍。（《潘佩珠年表》）

面對路線之爭，如何確定自己在越南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位置至關重要。將自身納入國族英雄的英雄系譜，以承接國族「排外」的精神傳統，進而取得行動的「合理性」與「主導性」。因此，潘佩珠不僅建構古往之「排外」的英雄系譜，也不遺餘力地將當代革命運動者納入此一英雄系譜與民族傳統之中，他撰寫許多以人物為主的歷史著作，如《慷慨史》²⁸與《越南義烈史》²⁹著重描寫與潘佩珠同屬第二世代的抗法民族

²⁷ 關於二潘政治思想之差異的討論，參見白石昌也，前揭書，第七章第一節「ファン・チュ・チン（即潘周楨）との論争——政体問題をめぐって」，頁 249-259。梁志明：〈潘佩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257-273。〔越〕吳雪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越南進步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44-47。

²⁸ 《慷慨史》目前下落不明，潘佩珠在為其革命同志裴正路（Bùi Chính Lộ，又號麗梅子，生卒年不詳）所寫的傳記《再生生》裡，提到他撰作《慷慨史》的緣由：「余生不幸，偶值時艱，區區之心，每有所補救社會於萬一。十年奔走，一事未成，此七尺區區者巋然固在，而余同志親友，先余而慷慨就義者，不知其幾。設使余所謀之事不成，而予乃於此至暫之時期，苟活偷生，為余同志之後死物，予異日於九原下見余同志，尚復何顏！余清夜椎心，背人揮淚，徒生耶肝腸太苦，欲死耶希望

運動者之慷慨犧牲、壯烈取義的事跡，其書名已強烈昭示其特殊性，成為實實在在的「英雄譜」³⁰，這也是他和同志從事革命事業重要的「宣傳品」。而在潘佩珠的自傳裡，也時常可以看到他為犧牲殉國之同志所寫的小傳。甚至常以英雄許人，也以英雄自許的潘佩珠³¹，也將自己置入國族英雄的行列之中：

未灰。天乎，天乎！予何以對余同志親友。予於是憤，予於是痛，予於是噓唏哭踊而不知所為，則惟有濡淚為墨，調血為硃，取諸先死者之事實編為小冊，綴為短篇，行坐必與之偕，昕夕焚書，回首而禱祝，聊表余永不忘之忱，且志余罪，名之曰《慷慨史》。而此出生入死、出死入生之麗梅子，乃早已登其姓名於史上。」有意思的是，在這部小說接近結尾的地方，潘佩珠又云：「嗟乎！七八年間，予同志心腹殉難成仁者，接踵於內外，鶩鶩予影，何以為生，聊取《國魂錄》一編，登君姓名於其上，清晨靜夜，焚香而禱祝之。天乎天乎，予此時之心腦中，惟知有既死之麗梅子而已。」上述引文所提到的這兩本著作，不僅性質相同，而且名稱也有密切的關聯，「慷慨」犧牲者足以喚起「國魂」，這應該是同一本而有不同名稱的著作。引文見潘佩珠著，陳慶浩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再生》，頁 45-46、58。雖然未能見到潘佩珠自撰的《慷慨史》，但另有一部性質相近，而與他關切密切的《越南義烈史》（1918）可以作為討論的對象。

²⁹ 根據《越南義烈史》版權頁和書前序言，可知此書作者為鄧搏鵬（Đặng Bạt Bằng, 1887-1938），而潘佩珠為「修訂者」。不少學者均指出這部著作實為多人合撰之作，而潘佩珠不僅是其中一位作者，也負責修訂全書，潘佩珠對於此書的形成與出版可說是有決定性的作用。而他也在其自傳《潘佩珠年表》裡數次提到參與此書的創作，例如「余其修《越南義烈史》冠以曾拔虎傳，非私意也」、「杜基光之結果不可不記，余曾於《越南義烈史》詳之」、「《越南義烈史》純為紀念諸先我殉國之同胞，凡所耳聞目見之事實，及所得於同志追述者，錄入是編。其尚未蓋棺之人，俱不登載，蓋有待也」。所以不少學者將此書視為潘佩珠的著作，如章收、白石昌也等人。關於《越南義烈史》的成書過程與撰作者之身份的討論，詳見〔越〕鄧搏鵬著，〔日〕後藤均平譯：《越南義烈史——抗佛獨立運動の死の記録》（東京：刀水書房，1993），頁 22-26。章收：〈關於《越南義烈史》〉（“Về Tác Phẩm Việt Nam Nghĩa liệt Sử”），《潘佩珠全集》第 5 冊，頁 11-20。附帶一提，章收教授非常詳細地探討鄧搏鵬的眾多名號（如子敬、有鵬、沖鴻），但他認為鄧搏鵬中的「搏」應該為「搏（Đoàn）」，理由是「搏」、「搏」兩字形近，排版者錯將原本的「搏」排成「搏」，再加上《莊子·逍遙遊》中有「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句，故應為「搏」。但這個看法仍有商榷的餘地，首先，「搏」、「搏」兩字的確容易形近訛誤，是有手民誤植的可能，但也不可能從版權頁到潘佩珠所作的「凡例」，以及書前四篇序言（合作者）全部排字錯誤，均作「搏」字，而未見所謂正確的「搏」字。其次，《莊子·逍遙遊》中的「搏扶搖」之「搏」亦有作「搏」字，如章太炎（1869-1936）有此主張，見氏著：《莊子解故》，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 6 冊，頁 127。而後藤均平則是使用「搏」字，但卻以片假名標其音為「ドアン」，為「搏」字的越文標音“Đoàn”，見頁 22。目前在沒有更明確的證據之下，筆者暫從原說。

³⁰ 潘佩珠另撰有〈河城烈士傳〉、〈真將軍〉、〈嚼菜禪師〉、〈范鴻泰傳〉與〈阮小羅先生傳〉等人物傳記，文中也多稱傳主為英雄，或以英雄視之。

³¹ 潘佩珠曾提到自己的性格是「冒險敢為，常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慨，而於壯年辰〔時〕尤甚。」他從組織試生軍失敗一事，體會到「知凡欲為英雄，必潛有所養；欲圖大事，必積有所謀。躁進輕動之徒，暴虎憑河，無能為也。自是之後，凡十餘年。予專從事於修養，一方面益致力於時尚之文

雖然世界無一落而不起之潮，古今無一成而不移之局勢，予之造此失敗，安知其非我國民之福乎？雄王之遺胤未斬，黎皇之舊史仍新。凡我國民其抱予所懷之志者，必有千予萬予億兆予，願懲於予之失敗，而謀所以成。其知醫也，無俟於九折臂矣。³²

嗟乎！予之歷史，百敗無一成之歷史耳，流離奔播幾三十年。連坐之累，殃延郡國；黨錮之獄，毒流同胞。每半夜撫心，仰天揮淚。蹉跎二十餘歲，慙負鬚眉，翹望無名之英雄，有甚饑渴。夫古來鼎新革故之交，掃蕩澄清之役，無失敗而能成功者，曾有幾何。法蘭西建共和民國，經三四次革命而始成，其明證也。吾儕苟鑒於已往之覆轍，思改其所以敗者，急籌其所以成者，求生路於萬死之中，確定良方於九折臂之後。機事必密，則無破綻之憂；心德必同，以圖洗血之業。有成功之一日，則潘佩珠之歷史，寧非後起者之前車哉。（《潘佩珠年表》）

潘佩珠承認自己從事民族運動的挫敗是一部失敗的歷史，他將一切全心全力地投入國族之中，承繼先祖雄王、黎皇之血胤遺緒，與他們同處於排外抗敵的行列，他的成功將是國族的成功，而他的失敗也是國族未來成功的借鑑，他將自己這位失路英雄與國族的興盛衰亡緊緊地牽繫在一起。他期待未來的有千千萬萬的國民受到他的感召與鼓舞，能繼續他這位國族英雄未完的志業，而這也是他寫作自傳的深意。至此，潘佩珠終於完成了一套從古至今、從失敗到成功，可以凝聚認同、激發種性、振興國魂的英雄系譜。這套屬於越南人的英雄系譜，以國家民族為主體，寄寓了整體國家民族的想像，藉此回應國族的危機，而這也是過去越南歷史書寫所未能達到新境界。至此他的關懷不再只是帝王一家一姓政權移轉的問題，而是牽繫整個國族的命運與未來，也因為這種新關懷，潘佩珠被視為越南國族史學的開拓者。³³

藝，思搏一名，務厭俗譽，以預為他日馳騁之地步。一方面潛求古兵家戰陣之策籍，如《孫子》十三篇、《武侯心書》、《虎帳樞機》、《兵家秘訣》等書，皆於深夜密室，手寫而熟念之，以預為他時實行之模本。」顯見他年少時便以「英雄」期許自我。而當他與梁啟超一同會晤犬養毅（1855-1932）時，一同與會的柏原文太郎（1869-1936）見到潘佩珠的言行，稱「予今日見君等，恍若讀中古時豪傑傳。」可見潘佩珠不只期待英雄，更以英雄自許。以上所引均見《潘佩珠年表》。

³² 潘佩珠：《獄中書》，《潘佩珠全集》第6冊，頁350。

³³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頁738-739。又如David Marr認為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是越南第一本訴求革命之史著，見David

三、排外的國族：面對他者的國族論述

潘佩珠調動一連串的歷史資源，召喚古往今來的英雄，以完成一套連貫完整的英雄系譜，而排外英雄的序列則是再現了一個不斷抵抗外人、面對他者的國族歷史。這反映他們如何看待自我與他者之形象，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最終的目的是要建構自我政治文化上的主體性。而這個形構英雄系譜，打造國族論述的過程，其實與族群和國家的集體記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群體包含家庭、某個社會階層、職業群體，或是民族國家，會透過選擇、重組與再製「過去」，來創造群體自身的共同傳統，界定群體的本質與維繫群體的凝聚。³⁴而根據學者的歸納，集體記憶具有以下特質：（1）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2）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3）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來說，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因為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或是心靈的社會歷史結構；回憶是基於此心理傾向上，使當前的經驗印象合理化的一種對過去的建構；（4）集體記憶賴某種媒介，如實質文物及圖像、文獻，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³⁵

越南自古以來不斷受到外來者的侵略與統治，這個國家只好在被侵略／反抗、被殖民／獨立的歷史甬道裡來回穿梭，一再地爭取自治與獨立。對這個族群來說，排外自立的歷史記憶已經溶入民族的血液，不斷地銘刻在族群的意識之中，而成為這個群體特有的心理傾向。面對在法國殖民之下，國族的衰弱與危機，潘佩珠不得不調動蘊藏在歷史之中的民族集體記憶，呼喚英魂重返國族聖壇。他有目的地汲取、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越南反殖民主義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14. 而越南學者胡雙 (Hồ Song) 認為《越南國史考》則是越南首部書寫越南民族歷史發展之作，強烈的民族意識貫穿其中，詳見氏著：〈《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對越南史學的貢獻〉(“*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Một Đóng Góp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ào Nền Sử Học Việt Nam*”)，收入《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11-20。

³⁴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51。

³⁵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50-51。

重組歷史上可茲表彰的排外英雄事蹟，集體記憶的呼喚打造了屬於越南的國族論述。

潘佩珠建構國族英雄系譜時，特別揭櫫「排外」二字，在強調「凡為國人即皆是編中人」的《越南國史考》裡，專設一章「我國先世排外之強立之英雄」，鋪寫「排外而成功」與「排外而失敗」等一系列英雄的事蹟。³⁶往後，他延續這樣的論述主軸，讓近當代的排外英雄攀援而上，以完成英雄系譜的建造工程，進一步形構了「排外」的國族論述。潘佩珠如此強調「排外」的國族論述，反映的其實是越南「自我」面對外人「他者」時的自我想像，這常是國族建構與想像的特色，對此，沈松僑提到：

國族建構的命脈繫乎國族邊界的區劃與維持；而這條界線的釐劃，同時也為國族成員的群體認同，設定了一個自我參照不可或缺的對立物——國族的「他者」。因此，對於國族的想像，事實上乃是以這些「他者」的建構為前提。³⁷

儘管潘佩珠雖然沒有使用「他者」如此現代性的字眼，但他在打造國族英雄時，已經很明確地標舉「排外」，而這個「外」就是與國族相對的「他者」——尤其是指外來的侵略者或殖民者，清楚地劃清彼此的界線。而在還沒描述排外英雄的事蹟之前，他就提到：「西人一來，（越南人）四體投地，外人見此，謂我國人素無排外性質。噫！亦冤我人甚矣。」為了破除外人對其國族的誤解，他拋出了「我國人喜排外之素性」的命題，越南人在天地奇崛之氣的陶鑄之下，「必非俯首低顏，甘終世為奴隸」。³⁸看似要向外人澄清，實際上是要追尋自我的主體性，強調我族與他族的差異，而得到自我的覺醒；藉由我群與異己的互動，完成自我的認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潘佩珠的國族論述特別強調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追述來自祖源血胤的同胞愛。這是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國族常見的方式

³⁶ 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420、422。目錄標題與內文標題略有不同，內文標題作「我國先世排外而獨立之英雄」，見頁474。

³⁷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126。沈氏接著提到：「就此一層面而言，晚清時期透過『民族英雄』的創造，逐步展開的中國國族想像，也正是一個找尋『共同敵人』的『異己化』過程。」

³⁸ 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474。

之一，沈松僑借用 Ana Alonso 的看法提到：

國族主義者往往利用一種「隱喻性的系譜」(metaphorical genealogy) 來表述國族的過去，從而製造出國族內部休戚相關、誼同一體的假象。在此論述策略的運作之下，國族被想像成一個依恃親族紐帶相維繫的群體。這種「國族血緣」(national blood)，在空間的橫向層面上，將所有的國族成員轉變成兄弟手足；在時間的縱向層面上，又把他們化作同一先祖的子孫後裔。國族，透過這種隱喻性的轉化過程，被當作是一個「家族」，一個永恆的存在。³⁹

最鮮明的例子就是中國國族主義者透過「黃帝神話」的動員與操弄，讓所有中國人都成為了「炎黃子孫」，進而形塑出晚清以來的國族認同。⁴⁰潘佩珠對於如何透過血緣親族的紐帶，將同為越南始祖雄王的子孫後裔轉化為不分彼此的同胞兄弟，以激發成員愛家愛國愛同胞之情，進而為國家犧牲，是有清楚的認識的，他說：

安南人即皆雄王之苗裔也。對於世界人，當然自成一族。對於我國人，尚何族姓之可別乎？同國所產即為同胞，乃天賦之原素，非人造所得而離異。明乎同胞之義，然後國家之義益圓滿而日進於強。蓋知同國為同胞，則知國人所享之幸福，是為吾同胞之幸福。吾同胞所事之幸福，是為吾自身之幸福。吾自身之幸福，必至於同胞榮樂，而真福幸乃可言。吾為同胞謀幸福，即犧牲吾身，有所不恤。非不愛身，愛身之至者也。蓋幸福被於同胞，其為吾身之快樂尊榮至矣。是以愛自身甚者，必愛同胞。愛同胞篤者，必愛國家。愛國家真者，必犧牲其一身自私自利之事，而以竭力於衛國。同胞之義，定國家之元氣也。⁴¹

潘佩珠認為越南人有共同的先祖，這種天賦之中不由分說而代代傳遞的血脈，締造了一個成員不分彼此、同質化的國家，同一國者即為同胞，而同胞之幸福即自身之幸福，自己的幸福必然也與同胞國家一起分享。在「愛（自）身＝愛同胞＝愛國」

³⁹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2），頁31。不少學者也有相似的看法，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44-45。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5。

⁴⁰ 詳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1-77。

⁴¹ 潘佩珠著，姚麗、嚴明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後陳逸史》，頁401。

三者一體的訴求之下，即使為同胞國家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為國家與同胞能得到幸福，如同自己也得到幸福一樣。因此，真愛國家、篤愛同胞者必然樂於為國家和同胞犧牲。潘佩珠在另一個版本下了一個結論：「同胞之義，與國家之義，互相發而互相成，其理由乃如此。」⁴²

正如 Anderson 對於愛國主義的觀察，他認為民族的某些屬性融入膚色、性別、出身和出生的時代，在這無法選擇、不得不然的「自然的連帶關係」的事物中，讓人有種「共同體」的感受。而正是這種不容選擇的連帶關係（或是一種宿命感），使愛國主義戴上了公正無私的光環，有著無私的愛與團結。也正因為這個理由，民族可以要求其成員為其犧牲。⁴³所以，他在〈范鴻泰傳〉裡提到：「五千萬雄王苗裔，一半為血性兒。匹夫有責之義，發捨我其誰之思，豈獨一范君已者。」鼓舞那些身為雄王後裔的血性男兒，發揮使命感，追隨范鴻泰（Phạm Hồng Thái, 1892-1924），盡到為國犧牲的匹夫之責。⁴⁴潘佩珠從同一祖源層層推論至愛國愛同胞之義，加強族群之間的聯繫與認同，個人的意志與人群的差異就此消融在愛國主義裡，愛國愛同胞取得了超越一切的認同，從而建構了一個國家主義為主的共同體。透過這樣的論述，同源共祖的國族也與非同血脈的他族異種拉開了距離，突顯彼此的差異。

其次，是強調族群歷史的輝煌與榮光。族群輝煌的歷史記憶與國族建構之間的密切關係，Ernest Renan（1823-1892）與 Anthony Smith 都有扼要的說明：「輝煌的歷史、偉人、榮耀等等，乃是國族形成的社會資本。」⁴⁵為了創造一套足以令人信服

⁴² 潘佩珠著，陳慶浩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重光心史》，頁 312。而發表在《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將原本《後陳逸史》的「安南人即皆雄王之苗裔也」更改為「我一國人，即皆始祖黃帝之後裔是也」（頁 312）。同樣地，《重光心史》的前言也將原本的「豈有天帝子孫、聖神苗裔之我同胞」（頁 366）改為「豈有黃帝子孫、聖神苗裔之我同胞」（頁 281），這些更動使得原本「排外（中國）」的立場顯得自我矛盾、游移不定。如同上文註 21 所述，筆者認為越南抄本《後陳逸史》較為代表潘佩珠排外抗敵的明確立場。

⁴³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頁 156-157。

⁴⁴ 潘佩珠：〈范鴻泰傳〉，《潘佩珠全集》第 5 冊，頁 662。范鴻泰於 1924 在廣州刺殺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馬蘭（Martial Henri Merlin, 1860-1935）不成，後投白鵝潭自盡。事雖不成，卻為越南革命帶來不少影響。潘佩珠也為此殉國英雄撰寫英雄譜，納入越南國族英雄的系譜之中。

的『國族』表述，必定先要重新發現並奪佔一個光榮而獨特的『過去』。⁴⁵歷史記錄了「人」的行事活動，而「英雄」做為特殊的群體，往往代表著國族的榮耀與歷史的輝煌，常被視為國族論述的重心和靈魂。在潘佩珠的筆下，越南國族的輝煌記憶幾乎都與「英雄」有關，也就是他所說的「先人」與「仁人義士」的建國史，而國家之獨立自治是建立在成功「排外」，與他者互動的基礎上，他說：

嗟乎！我國民，我同胞，其勿謂古事為不足談也。吳、越之不敵，婦孺能言之！吳之土地三十倍於我，吳之人民數百倍於我，然吳人郡縣我國，乃不能及二十年。以地理之毗連，軍情國勢之慣熟，而大小、眾寡、強弱之懸絕，又相天淵。然欲滅我種，吞我圻，埋沒我國號，尚不可得。我先人之有造於我後嗣，豈其微哉？⁴⁶

潘佩珠提醒國人不可忽略對過去歷史記憶的認知與理解，連婦人孺子都能朗朗上口的光榮歷史，國人更有記憶銘刻的必要。潘佩珠刻意強調國族在種種懸殊處境和不利條件之下，以少勝多、以寡擊眾、以弱敵強而成功排外的輝煌記錄。國族英雄甚至與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相較，亦不遑多讓。⁴⁷而先人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不只是有形的保種存國，免於被侵略而已，而是有讓人們可以不斷回憶的榮耀歷史，這無形的資產有助於人們找回國族的自信與認同，以及面對他者的尊嚴。現實國族的失意匱缺，也在回味歷史的光榮感中獲得補償。回味過去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指向光明的未來，找出日後行動的方向，因為過去做得到，未來也做得到。既有光榮的過去，必然也能有一個可以被許諾的燦爛未來，有為者亦若是。因此，潘佩珠大聲疾呼：「我先人亦英雄矣，我子孫何為不自奮哉！」⁴⁸失意國族在

⁴⁵ 轉引自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84。

⁴⁶ 潘佩珠著，姚麗、嚴明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後陳逸史》，頁 446。

⁴⁷ 越南陳朝將領陳興道成功抵抗元代蒙古大軍兩次入侵的光榮，也讓潘佩珠不禁盛讚陳興道之所以成功，原因在於「熱誠」、「識高」與「高尚之人格」，因此「縱使置王（按：指陳興道）於美洲未必不如華盛頓。蓋其胸懷無滓、襟量非凡，以濟世安邦為心，而不以崇高帝位為重也。有此人格，建大功濟大難直餘事耳。」見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 3 冊，頁 480。

⁴⁸ 在這句話之前，潘佩珠讚美越南李朝將領李常傑不僅能抵禦中國宋代軍隊，還能回擊宋軍，並南侵占城，實為越南絕無僅有之大功蹟，因此他說：「按我史上下三千年間，欲與外國交兵皆敵至而禦之。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略人土地、俘人民，真正伐國之兵，惟此一舉，誠曠前絕後之快觀也。」

重溫舊夢與憧憬未來之中，得到更積極樂觀的行動力量。

再次，是突顯他者加諸我族的苦難與恥辱。與追溯來自祖源的同胞愛和強調族群歷史的輝煌相較，突顯國族被他者所加諸的壓迫與恥辱，更能達到凝聚國族、鞏固認同的效果。對於群眾運動深有體會與研究的賀佛爾（Eric Hoffer，1902-1983），便提到：「群眾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運用和理解的一項，就是仇恨。」「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劑」。⁴⁹而這也是潘佩珠最常使用的一種論述策略，因此無論是政論文章或是漢文小說裡，我們都很容易看見潘佩珠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有效地操弄，（法國）殖民者所帶來的苦難與壓迫，甚至是鄙視羞辱，他在〈敬告國民〉（1906）這一篇向國民宣示、警醒國民的文章裡提到：

偽保護法蘭西者，鯨涎刮海，狼欲滔天。富強挾以鴟張，仁義假為鳩毒。存吾君而空其國，謂五洲公論為可欺；白吾地而殖彼民，殄億兆蒼生而奚惜。慘毒至此，偷忍何堪。⁵⁰

又如潘佩珠論越南人在法人統治之下被視為「禽獸草菅」：

法人以禽獸畜我，以草菅視我。畜之以禽獸者，投之以食，伺其肥而烹宰之；視之以草菅者，踐踏誅刈，焚燒耨去，無或顧惜。……今法人之車船，所以待我國人者不然。厚收其價租，而苛刻其規律。飲食不問其有無，起居不問其安否。坐寢與牛馬雞豚同欄，往來與油炭汗穢相伴。呈稟未及，鞭笞遽加。催銀稍遲，拳踢即到。推此一事，凡事皆然。法人固謂彼南人禽獸也，草菅也，待之當如是也。⁵¹

殖民者不僅視我族為禽獸草芥，更以對待禽獸草芥之法來對待我群，潘佩珠在這些

彼扼腕於鞭撻撻夏之王安石，尚不得志於我南。我先人亦英雄矣。我子孫何為不自奮哉！」見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全集》第3冊，頁482。

⁴⁹ 〔美〕賀佛爾（Eric Hoffer）著，梁永安譯：《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131、136。

⁵⁰ 潘佩珠：〈敬告國民〉（代疆抵所作），《潘佩珠全集》第2冊，頁552。此文在《潘佩珠年表》裡，作「敬告全國父老文」。

⁵¹ 潘佩珠：〈海外血書〉（1907），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702。

論述裡極力地劃開我群與他者的距離，法殖民者是挾富強、假仁義的無情侵略者，而我群卻是受盡苦難、慘毒的無辜受害者，即使是排外英雄也無法倖免於難，梟首戮屍、掘墓而焚，地下的英魂英靈仍然不得安息。⁵²在族群受苦受難受迫害的共同經歷裡，打造出國族的集體悲情，在對他者的集體憎恨與受難情緒的催化之下，他呼籲國人「與其坐而待斃，何如起而鬥爭」，一同「排外」，抵禦外侮。

揭露殖民者加諸於被殖民者的迫害和苦難，對內可以強化族群認同與集體情感，以爭取國民對民族運動之支持和投入，對外則可以引起外界的關注與援助。所以當梁啟超得知越南亡國的狀況之後，便積極鼓勵潘佩珠「多以劇烈悲痛之文字，摹寫貴國淪亡之病狀，與法人滅人國種之毒謀，宣布於世界，或能喚起世界輿論，為君等外交之謀价。」（《潘佩珠年表》）像《越南亡國史》（1905）、《天乎帝乎》（1923）都是這類作品，它們也的確得到世人的不少關注，如《越南亡國史》，1906 年便有朝鮮重要的翻譯家玄采（1856-1925）翻譯《越南亡國史》出版，1907 年更出現了兩種譯本，1908 年亦有再版。⁵³《越南亡國史》也被收錄於朝鮮 20 世紀初期的小學教科書《幼年必讀》之中，讓它成為朝鮮家喻戶曉的啟蒙教材，「向國民介紹了外國的建國英雄的傳記和獨立運動、革命運動的歷史，為提高國民的獨立意識和歷史意識進行了努力。」⁵⁴又如胡適（1891-1962）在閱讀《天乎帝乎》之後，對越南所遭受到的壓迫苦難寄予無限的同情。⁵⁵

⁵² 如第一代抗法運動的代表人物潘廷逢死後受到慘烈的酷刑，「逢既死，法人購得逢屍者，有厚賞，然逢麾下無肯指引者，法人遍求諸山中，得山蠻指逢墓處，法人發其屍，驗之，屍有杖指，棺面有咸宜帝敕賜兩圻經略大使平西大帥之印，乃出其屍，沃以火油，燒之。恐有斂灰而葬者，復散其灰，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是之酷刑慘狀者，乃一于歐洲文明國見之。治真正盜賊，無此律也。況其為勤王之義士耶，文明國其何以解天下之疑也。」潘佩珠嚴厲批評文明者卻用最不文明人道的方法對待義士，見潘佩珠：《越南亡國史·國亡時志士小傳》，收入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全集·專集》之 19，頁 9。

⁵³ 關於《越南亡國史》在朝鮮翻譯和出版的狀況，詳見鄒振環：〈梁啟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1（2000），頁 308-318。並可參見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頁 133-136。

⁵⁴ 〔韓〕姜萬吉著，賀劍城等譯：《韓國近代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頁 296。

⁵⁵ 胡適云：「現在我們得讀潘是漢先生《天乎帝乎》一文，審查他列舉的歷史上和法律上的確證，使我們不能不深感亡國的慘禍竟有如此之烈，使我們不能不向安南的志士們抱無限的同情。法蘭西民

除了凝聚認同、激發種性，以及獲得外界的關注與援之外，揭穿殖民者所帶來的迫害，還能賦予民族運動一個非常合理的理由，甚至是執行武裝行動或是暴動暗殺的好藉口。當把他者視為「壞人」或是「侵略者」時，自我的防衛便是符合「正義」的權利和義務，因為是他們先動手，先傷害我們的，我們的出手完全是出於被迫的。以正義為名，任何的行動都是合理而正當的，就像潘佩珠以此為范鴻泰以炸彈暗殺馬蘭一事辯護一樣，他認為真正的兇手不是范鴻泰，而是「慘無人道」的法殖民政府。⁵⁶

四、結語

有別於前賢對於潘佩珠筆下英雄身份的關注，本文試圖從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的角度切入，思考潘佩珠在憂國焦慮與興國企盼之下，如何建構並運用英雄系譜為其國族論述助長聲勢、搖旗吶喊。進一步探討可以發現國族面對的「他者」雖然不同，但國族的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都同樣渴望英雄，期待英雄解決現實困境。現實的處境仍與過去有著密切的關聯，「排外」成為打通貫串越南歷史的主軸，也是英雄系譜能夠保持連續性與整體感的關鍵。因此，潘佩珠首先召請國族的始源英雄，繼而國族歷史上成功與失敗的英雄也連袂而至，並從民間和當代找來新一代的英雄，這些新英雄雖然「無名」但有「排外」之心，得以完成一套貫串上下卻又維持一致性與同質性的英雄系譜。而潘佩珠和他的革命同志們，也在這個系譜裡確定了自身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位置。

族素以『自由、平等、人類胞與』三大綱自豪，然而他們對安南人的手段真可算是人類史上的一大恥辱。」胡適：〈天乎帝乎·序〉，《潘佩珠全集》第5冊，頁577。

⁵⁶ 潘佩珠認為：「今吾黨乃竟以此劇烈手段相對待，則其為慘無人道之政府之代表故也。同胞諸公欲知炸彈案之主謀犯為何人乎，則曰主謀犯非他，乃慘無人道之法政府是也。慘無人道之法政府尚存，則炸彈案之主謀犯不可問矣。且暗殺一人，目為兇犯，然則明明蹂躪一國之民族，明明剝奪數千萬人之民權者，得謂非兇犯乎。以此之兇犯，激成彼之兇犯，故知炸彈案之主謀人，決不在彼而在此。」潘佩珠：〈范鴻泰傳·越南國民黨聲明書〉，《潘佩珠全集》第5冊，頁655。

潘佩珠所建立的國族英雄系譜，形塑出一個不斷排外、面對他者的國族。為了打造這個國族，潘佩珠追溯祖源血脈而訴求同胞之愛，也強調群體歷史的輝煌與榮光，尤其突顯他者加諸於國族的苦難。國族便在溯（始祖之）源、揚（己身之）威、著（他者之）惡之中得以凝聚與鞏固。排外的國族透過強調我族與他族的差異，而得到自我的覺醒；藉由我群與異己的互動，完成自我的認同。這不只是越南國族的集體歷史記憶，也是這個群體特有的共同心理傾向和政治訴求。在國族裡，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各路英雄好漢來去的身影。

排除異己，凝聚我群，劃定族群邊界，是許多民族主義者建構國族時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民族主義者或是追溯自身的光榮歷史與優良傳統，或是將目光投向光明的未來，更有訴諸民族的仇恨與危機，就這一點來說，不僅近代越南民族運動者潘佩珠如此，近代中國與韓國的民族主義者亦是如此。⁵⁷潘佩珠建立英雄系譜以打造國族的方式，與近代中韓兩國之民族運動者相近，儘管中韓越三國的民族運動者面對的他者或有不同（中國漢人民族運動者還得處理「滿清」此一他者的問題，進而衍生出兩種民族英雄系譜與論述），但也讓我們見到近代東亞面對他者時的共同趨向，即在與「他者」的互動之中，促使「自我」的覺醒與凝聚。在這樣的視野之下，近代東亞便有相互照應的可能，進而形成東亞共同的想像與經驗，而其中的互動關係以及共同經驗之下的差異，亦待更深入的探索。⁵⁸

限於篇幅和時間，筆者僅能處理潘佩珠如何召喚英雄、打造國族的過程與方式。實際上，潘佩珠與英雄及國族之間，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討論。例如潘佩珠究竟期待怎麼樣的未來英雄，來接續國族未完的英雄系譜，是如前賢所說的知識分子，還是工農階級，抑或是另一種群體，或是說因應口號與行動的不同、理論與實際的差異，

⁵⁷ 中國方面詳見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二文。而韓國知識人對於國族英雄的召喚與書寫，詳見葉乾坤：〈梁啟超與韓國的英雄主義〉，收入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960-1949》（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 505-532。

⁵⁸ 與本文有關的例子，是越南民族主義者潘佩珠與韓國民族主義者申采浩（1880-1936）兩人在英雄論述上都受到梁啟超程度不一的啟發。而上文也提到潘佩珠《越南亡國史》受到韓國知識人的關注。這些例子說明了近代東亞實為一關係密切，相互照應的運動體，而這其間的異同之處，值得深入考察。

而有不同的指涉對象。又如潘佩珠建立了「排外」的英雄系譜，但又時常召請「外族」英雄為其國族論述助陣，既排除卻又納入，顯示他對於「他者」愛憎交織的複雜情緒。⁵⁹而且，潘佩珠的知識建構充滿流動性，並非一封閉的知識結構，而是融混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這也使得他的英雄與國族論述在全球化語境之下，或是區域的互動之中，有著更為複雜豐富的面貌。而上述這些饒富興味的問題，則有待他日繼續探索。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越〕章收（Chuong Thâu）編：《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

〔越〕潘佩珠：《潘佩珠年表》，越南河內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稿本，編號：Vhc.2138。

〔越〕潘佩珠著，陳慶浩等校點：《潘佩珠漢文小說集》，收入陳慶浩、孫遜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越〕潘佩珠著：《越南亡國史》，收入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全集·專集》之19，上海：中華書局，1936。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章太炎：《莊子解故》，收入《章太炎全集》第6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⁵⁹ 「自我」與「他者」的矛盾衝突，其實在潘佩珠的民族運動歷程中不斷上演。他在面對法國殖民情況下，不斷地爭取外國（日本、中國）的援助，因此有著「求外」與「拒外」的重層性。而在他的思想與實際活動中也有著「侵略」與「反侵略」、「追求文明」與「反文明」的重層性，這些重層複雜的面貌亦值得進一步探索。

二、近人論著

-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1999。
- 〔美〕賀佛爾（Eric Hoffer）著，梁永安譯：《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越〕吳雪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越南進步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 〔韓〕姜萬吉著，賀劍城等譯：《韓國近代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
-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2），頁 1-77。
-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33（2000.6），頁 77-158。
- 胡萬川：〈民族、語言、傳統與民間文學運動——從近代的歐洲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里仁書局，2010，頁 1-34。
- 梁志明：〈潘佩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257-273。
- 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 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學刊》1（2010.10），頁 119-141。
- 陳鴻瑜：《越南近現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
- 章收：〈關於《越南義烈史》〉（“Về Tác Phẩm Việt Nam Nghĩa liệt Sử”），收入章收主編：《潘佩珠全集》第 5 冊，頁 11-20。
-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

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葉乾坤：〈梁啟超與韓國的英雄主義〉，收入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1960-1949》，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 505-532。

鄒振環：〈梁啟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1（2000），頁 308-318。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越南反殖民主義 1885-192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ー・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越〕鄧搏鵬（Đặng Bác Bằng）著，〔日〕後藤均平譯：《越南義烈史——抗佛獨立運動の死の記録》，東京：刀水書房，1993。

〔越〕阮廷註（Nguyễn Đình Chú）：〈研究潘佩珠的英雄觀〉（“Tìm Hiểu Quan Điểm Anh Hù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文學雜誌》（*Tạp chí Văn học*）12（1967），頁 1-14。

〔越〕阮董之（Nguyễn Đồng Chi）：〈潘佩珠英雄觀再探〉（“Bàn Thêm về Quan Niệm Chủ Nghĩa Anh Hù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歷史研究》（*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111（1968.6），頁 15-23。

〔越〕胡雙（Hò Song）：〈《越南國史考》——潘佩珠對越南史學的貢獻〉（“*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Một Đóng Góp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ào Nền Sử Học Việt Nam*”），收入《潘佩珠全集》第 3 冊，頁 11-20。

〔越〕章收：〈關於《重光心史》（或是《後陳逸史》）〉（“Về Tác Phẩm *Trùng Quang Tâm Sự* (Hay là *Hậu Trần Dật Sử*)”）〈潘佩珠意識中的英雄人物〉（“Nhân Vật Anh Hùng theo Ý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分別收入氏著：《潘佩珠研究》（*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4，頁 270-285、555-583。

